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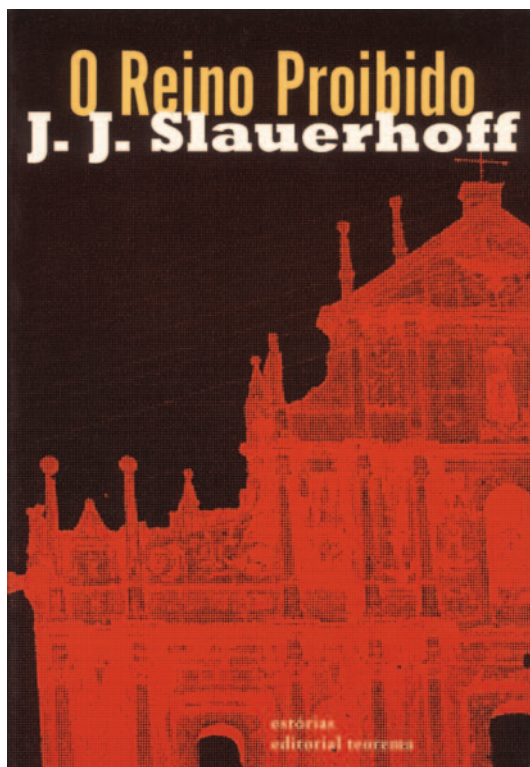
避難和創作之地

荷蘭作家斯勞烏埃霍夫筆下的澳門

坡 斯*

我早就聽說過澳門迄今還保留着古老的廟宇、教堂和牌坊等古代遺產，還有一個曾經讓一位詩人蟄居其中的巖窟。那詩人曾經在那裡寫下一部偉大的史詩，記述了華士古·達·伽馬的航行。然而，不知迄今尚有人去那兒參觀憑弔麼？（摘自斯勞烏埃霍夫《禁錮的王國》）

或許是在某次往里斯本的旅途上，或許是在乘荷蘭皇家豪華遊輪的公務旅行中，斯勞烏埃霍夫（Jan Jacob Slauerhoff, 1898-1936）從葡萄牙文學家阿爾比諾·福爾雅斯·德·桑帕約（Albino Forjaz de Sampaio, 1884-1949）那裡獲得了不少知識。因為當時是1930年，桑帕約正在撰寫《插圖本葡萄牙文學史》。可以說那次接觸引領斯勞烏埃霍夫走進了葡萄牙文學史。在他作品的第367頁（或者說其於1930年11月底發表的作品第24章）敘述賈梅士的生平和作品部分，我們看到了斯勞



斯勞烏埃霍夫《禁錮的王國》封面

烏埃霍夫的兩幀照片。一幀照片的說明是：“澳門巖洞前的賈梅士銅像，旁邊站立的是發表了不少有關賈梅士詩選及一本關於詩人在東方生活的作品（至今尚未問世）的荷蘭人斯勞烏埃霍夫博士。”而另一幀說明是：“發表過多部膾炙人口的散文和詩篇的作者斯勞烏埃霍夫博士在佛朗德里亞（Flandria）號遊輪上。”

現在，第一張照片刊登在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那本書的封底。那部題為“禁錮的王國”的書是在1932年出版的。斯勞烏埃霍夫將自己的成功歸功

* 坡斯（Arie Pos），荷蘭人，1989年移居葡萄牙，萊頓大學荷蘭文學和比較文學系畢業。科英布拉大學荷蘭文學系教師，擅長翻譯16世紀的旅行記和荷蘭現代文學作品，已經將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庇山耶、米格爾·托爾加、若熱·德·塞納及若澤·卡多佐·皮雷斯的作品譯成荷蘭文，還分別與洛瑞羅和科托（P. Couto）合作，將林斯霍騰（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斯勞烏埃霍夫和塞斯·努特博姆（Cees Nooteboom）的作品翻譯為葡文。

於他與桑帕約的相識，因此請桑帕約為該書作序。

我們知道，在1930年小說還遠沒有完稿。整個寫作過程開始於1927年初，因為斯勞烏埃霍夫是在澳門度過除夕的，還在當地購得了一冊蒙塔爾托·德·熱蘇斯的（C. A. 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1902年第一版）》之第2版。眾所周知，該書第2版在發行上市後不久就因葡萄牙當局的封殺令而被追回銷燬，沒有幾冊逃過厄運。該部作品到了1990年才得以用葡萄牙文首次出版，其題為“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叢書）。1928年，斯勞烏埃霍夫開始寫有關賈梅士的詩篇。斯勞烏埃霍夫從蒙塔爾托·德·熱蘇斯的作品中摘錄了不少有關澳門的資料，對這本小說起決定作用的是賴因霍爾德·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在1930年發表的傳記《從萊頓到賈梅士，葡萄牙政權的衰落和完結》。

必須指出，在上述關於澳門另一部有關賈梅士的作品中，皆出現與當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智識界非常崇尚的歷史文化視點相似的歷史觀。當然這主要歸功於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成功之作《西方的衰落，1918-19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還未散盡之時，智識界認為文化猶如生物那樣也會遵循“誕生-興旺-衰落-死亡”的自然法則，因此就預測西方文化必然毀滅。蒙塔爾托·德·熱蘇斯在其作品中將當時葡萄牙殖民地的崩潰局勢和宗主國的衰落聯繫在一起，而施奈德也在其作品裡描述葡萄牙王國如何衰落和宗主國在詩人去世那年如何喪失獨立，並將賈梅士作為其論據的代表人物，儘管至今歷史學家們對此依然各有看法。

事實上，斯勞烏埃霍夫想找到要更加明確闡述自己對世界看法的依據太難了。他認為自己是西方文明明顯衰落時出現的後起之秀，可惜離自己從青年時代就夢想的成功、發表作品、創造發明及征服西方世界的年代還很遙遠。他生活的年代是一個令人感到淒涼並且無法求得名望和實現豐功偉績的年代。他還將自己體能上的虛弱比做時代的衰落（與庇山耶頗相似）。他因此用最後的一點力量與自己必然的歷史命運抗爭，企圖尋得與自己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他甚



發表過多部膾炙人口的散文和詩篇之作者
斯勞烏埃霍夫博士在佛朗德里亞號遊輪上

至覺得西方精神世界的創造能力也已枯竭，藝術和科學技術方面已沒有開闢任何新道路可言。斯勞烏埃霍夫於是祇能回顧西方文明史中的輝煌時代，在那裡尋找與自己相似的歷史人物以激起創作靈感。在這些偉大的發明者、征服者（如哥倫布、達伽馬、成吉思汗、拿破侖）和“該死”的詩人當中有法國的波德萊爾（Baudelaire）、科比埃爾（Corbière）、蘭波（Rimbaud）、瓦萊里（Verlaine）和維隆（Villon）、中國的白居易、德國的荷爾德林（Hölderlin）以及葡萄牙的賈梅士。他在這些詩人身上拚命尋找精神聯繫，希望挽回20年代西方人已經失去的創作靈感。他認為同行前輩的影響一定會有助於自己的創作。在經過一番既要接受必要的影響又不能因被影響而束縛自己的困惑鬥爭之後，他希望創造自己的個性。當時他的確面臨被前輩影響所控制甚至被自己所尋找的精神所困厄的危險。在這場鬥爭中，為了

給自己的創作留下靈感的特徵，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甚至扭曲歷史真相，以達到顯示自己個性的目的。

我們如果要更加詳細地敘述斯勞烏埃霍夫的詩作，那就離題太遠了。我們祇要說他的詩作是當時荷蘭文學界的唯一者就夠了。而且他的作品與當時歐洲正在誕生的現代傳統相一致，當時有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有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中國和遙遠的角落》，有艾略特的《小國家和沒有個性的男人》，還有羅伯特·莫西爾和費爾南多·佩索阿的作品。在斯勞烏埃霍夫的作品中，我們感覺到了他在個性和人格表現方面、人物塑造和作品的完整性方面以及小說內容的交織和編排方面的一片紊亂。

《禁錮的王國》——從題目上就看得出那是指中國，但也描寫了個人的幸福和成功——事實上是一部現代派作品。不過他的作品將許多內容融合在一起，有些內容祇是在以後的年代裡才被納入現代派的範疇，所以說或許可以稱之為現代派初期作品。我們還可以將斯勞烏埃霍夫的現代派思想視為是在當時戰爭間隙年代對“人類條件”存有許多質疑的、如同在高壓鍋裡沸騰着的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混合。而斯勞烏埃霍夫作品中的當代派部分更是令人費解。評論家和讀者們還以為手上的作品是一部歷史小說或者是一部冒險小說。不過，倘如此認為便違背了該領域的規則。因為歷史的劃分從來都與事實不相同。再說，在荷蘭哪有人知道澳門的歷史及賈梅士的生平，所以也無從將小說中的描寫和歷史事實相核對。當然，這種比較在作品的描寫上是絕對重要的。為了讓故事情節更加曲折，斯勞烏埃霍夫選擇了不太通常的風格，即放棄簡潔明快而採用了曲折含蓄的手法，用多層面敘述使作品接近自己的象徵主義和現代主義風格，充滿了隱喻和影射的交織，極力改變對前景的描述，以至於使評論家們認為這部作品是詩人在文學小說創作中徹底的敗筆，或者祇是一部在鴉片作用下杜撰出來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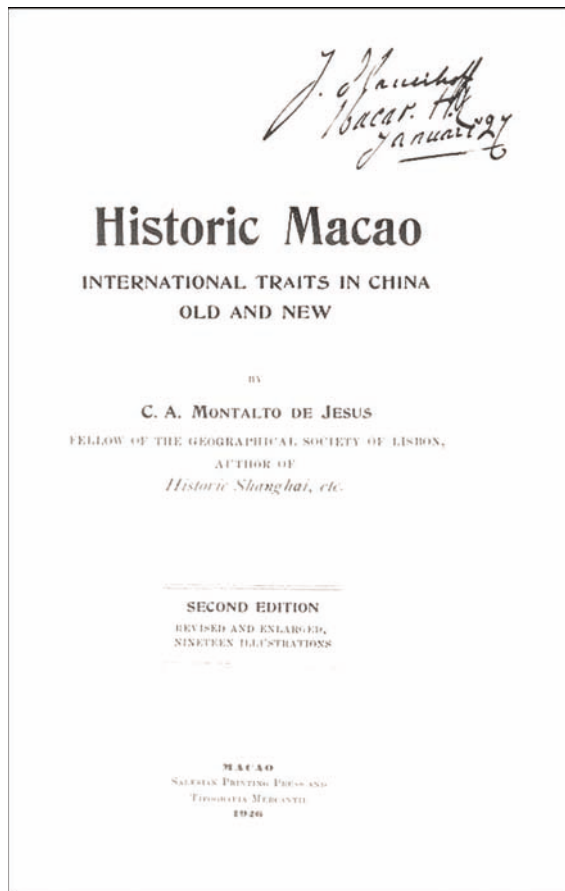
習慣了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新文學”和後現代派作品，並且適應了自我評判和非建設性批評

行為的今天，儘管對其大膽構思依然感到漠然，但其作品還是能讓讀者接受。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多集的作品和像電影《X-檔案》，《超級金錢帝國》及“藍色預言”和其它“新時代”的著名作品，也就很容易接受對超自然現象和虛擬現實的描述了。

顯然，斯勞烏埃霍夫在《禁錮的王國》一書中展示的是一個虛擬世界。作品髣髴從當時的現實世界開始下筆，但事實卻不然。這是一部象徵主義和涵義深刻的虛構作品，作品中引用的事實和歷史上的人物被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圖加以改造，被安置在沒落的西方文明、亞洲和澳門的葡萄牙王朝的背景之下。其中主要人物便是虛構的賈梅士形象。在斯勞烏埃霍夫筆下，賈梅士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浪漢，一個不受尊敬的流亡詩人。這完全是斯勞烏埃霍夫神話般的自畫像。他按照自己在作品裡編織的故事，展示了一個該死的、被流放的和四處乞討的詩人形象。而另一個主要人物便是那位不露姓名的20年代愛爾蘭無線電技術員。當然這也是按照斯勞烏埃霍夫自己的形象和意願創作的人物。那是一個在Musil眼中“沒有品位”的男人，一個在艾略特定位中“沒有頭腦”的男人，完全是西方文化衰敗時代的象徵性人物。書中的無線電技術員在一次輪船遇難事故後失去了自己的個性，而作者所說的輪船事故也祇是個隱喻。他沒有生活目標，祇尋求與過去時代的精神聯繫，以擺脫自己的空虛。這種精神狀態始於遠航東方的海上旅程之中。作品在背後披露的就是賈梅士精神，它終於在無線電技術員前往中國沿岸地區澳門時佔據了他，並給他希望。然後，在描寫輪船上的生活段落，無線電技術員乘的輪船被中國海盜襲擊（又一次採用比喻的手法使技術員完全失去個性），並被帶到中國內地荒無人煙的沙漠裡。斯勞烏埃霍夫這一虛構情節再次與賈梅士的經歷相合，即作為葡萄牙使館的列兵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失踪了。兩者被置於同一背景下。這是由於賈梅士必須完成自己的使命（撰寫《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意願佔據了失去個性的無線電技術員。他具有在20世紀裡掙扎的雙重性格，後來

回到澳門，在那裡的大三巴遺址前再次回到過去，並為了維護該島的安全參加了抵禦外來侵略者的鬥爭，即抵禦 1622 年荷蘭人的入侵。這時，作者將自己拉回到 16 世紀。不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賈梅士在該場戰爭之前就已經去世。但雙重性格的人物卻在抵抗外來入侵的鬥爭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當他遭到一個黑人（黑人奴隸的代表人物）襲擊時，他殺死了對方。雙重性格，從此之後開始重新剝離。這一描述象徵他已經擺脫過去的精神影響，並回到無線電技術員這一人物的原型中。賈梅士昏迷在地上，失去了記憶，躲進澳門的巖洞裡，在那裡專心致志地創作自己的詩歌《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是賈梅士的精神影響使無線電技術員逃出了中國沙漠，重新尋找到了自己的詩人（當然不是像先前夢想的征服者）的命運。無線電技術員回到了 20 年代，在澳門一家中國人酒店裡醒來，懵懵懂懂地回憶起自己夢幻般的冒險歷程，髻髻無法從過去的情景中逃脫，必須在現實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命運。他以為自己在中國內地隱士般的生活中能夠找到自己的命運。

賈梅士和無線電技術員的生活祇是小說故事展開的兩條主線。還有兩條線索，一條是作為整個小說故事情節的歷史背景線索，那就是葡萄牙王朝的歷史，從達伽馬和阿爾布克爾克最初的發現到葡萄牙人最早在中國的出現（如寧波——斯勞烏埃霍夫引用熱蘇斯作品中提及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著《遊記》的部分內容，還有皮雷斯使團的北上，以及澳門的形成等），直至 20 世紀的 20 年代。那是一部葡萄牙王朝的興旺和衰落史。小說的第四條線索便是澳門的歷史，從它的形成展開到無線電技術員所經歷的日子。作者描述的澳門殖民地是在許多偉大的發現者已經開始衰敗的年代形成的，它不能自立，一方面依賴着宗主國和馬六甲，另一方面依傍着中國。它在中國和葡萄牙兩者之間，任何企圖使澳門獨立的想法都會被遏制。因此，這塊殖民地便隨着宗主國的衰敗而進入沒落時期，而香港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興旺更使澳門雪上加霜。所



熱蘇斯《歷史上的澳門》封面（1926 年）

以說，賈梅士和無線電技術員以及小說中其他所有人物，都是處在這同一歷史背景下。賈梅士已經失去了那些偉大的發現者和征服者的力量和願望。儘管夢想着鴻圖大業，但祇能讓這些偉業在自己的詩篇中永存。而無線電技術員祇是那些隨着戰無不勝的軍隊離開愛爾蘭（一個被英國人奴役的國家，在那裡遇難者曾是愛爾蘭人的奴隸）並在海上遇難的人的後代。小說的這條思路又與葡萄牙人的歷史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急遽沒落的境遇使得無線電技術員成了當時澳門命運的同路人。由於兩個人都有着多民族的類似命運（同在澳門，但一個是中國—葡萄牙混血兒，而無線電技術員是葡萄牙／伊比利亞—愛爾蘭／凱爾特血統），因此他們都因葡萄牙的衰落而極力自衛。從澳門本地來說，這種自衛和抵禦力量來自阿媽神仙（斯勞烏埃霍夫已經從熱

蘇斯的作品中知道了這一神話故事，並因此得到靈感而編撰了一個故事），它千方百計地反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和統治。作為無線電技術員則是受凱爾特人的影響：士兵和流浪者，關鍵時候顯露出受英國人影響的救世主面貌使他能夠勇於克服支配自己的影響和精神障礙，並竭盡一切努力尋找自己的未來。

在斯勞烏埃霍夫作品的描述中，小說具有指南作用，它在象徵派的框架中體現了詩人本人在寫作方面靈感的複雜之影響。無線電技術員祇是詩人運用的一個比喻手法，通過他可以獲得前輩同行們的資訊，而且必須通過他們的影響以保留自己在創作中的獨特個性。斯勞烏埃霍夫的這一創作表現手法為古代女神配上了現代裝飾，既讓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人們喜愛，又讓他們擔心。不過，事實上小說也祇不過是對現代人的個性特徵危機的危言聳聽的見證。

相當有趣的是，後來被斯勞烏埃霍夫用做小說素材的好幾篇文章竟然倖存下來。我們從那裡可以看到小說故事的起源和發展。作者逝世後，人們在他的旅行箱裡找到了一本日記和一些記載着1926-1927年間他第一次到澳門的印象錄（曾經在 *Het China van Slauerhoff* 上發表）。那是1927年1月前後寫的初稿；還在他的書房裡找到了一冊從澳門或者香港購得的《歷史上的澳門》。在該書的封面留有“斯勞烏埃霍夫 / 澳門 - 香港 / 1927”的字樣。

倘要介紹他的全部文章，那將是件不易的事。但為了讓大家有個印象，我在這裡祇翻譯其中一些描述當年澳門的段落。他為了感悟葡萄牙殖民地的前景，在遠東的海上漂泊了一年多。他曾經感覺到自己已經失去了根基，遠離了歐洲文化，也無法與東方世界有多少真正的接觸。不過儘管如此，與東方的接觸依然誘惑着他，或許這是因為在輪船上根本就沒有文化生活可言。

在香港停留不久後，斯勞烏埃霍夫乘瑞安（Sui An）號輪船在1926年最後一天首次蒞臨澳門。

的確，我在離開英國在遠東的城市香港很久才抵達這裡的內海。我不知道身在何處，懷疑是在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和巴塞羅納之間的沿海岸。但我看到了一座教堂，巖石山頂上的一座白色燈塔，帶有空敞長廊的住宅和一條沿着海灣的大馬路。那巖石上面不是明明寫着“風景酒店”嗎？葡萄牙沒有內海啊。輪船掉了頭，我驚訝地發現，白色的教堂祇是一座牌坊，在它後面竟然祇有廢墟。現在，我可以在兩座山頭中間的炮臺和燈塔山之間看清一些東西了。我還看清了中國人的屋頂。我在哪裡？是在中國，還是在南歐？

輪船繞過礁石轉了一圈，前面出現荒涼的山坡，後面……毫無疑問那邊是中國：海港裡停滿了中國帆船，港口到處都是黃皮膚的人，一排排房屋前面的文字都是從上往下書寫，狹長的街道，空氣中瀰漫着魚腥味、油炸味、汗酸味，還有說不清楚的味道。

是夢想讓我來遠東隱居。

輪船由一大幫苦力簇擁着靠了岸。在人群中、船上和港口的一堆堆行李中慢慢閃現出了一條路。來客被幾十輛甚至上百輛人力車包圍住。沿着狹窄的街道，穿過商店、小吃攤及用欄杆擋着高窗的住宅、地攤以及苦力們或者說是奴隸們幹活的倉庫。從1867年開始，苦力從中國被輸出口，到現在仍然在香港被輸出口。

難道我又突然進入夢境？一個廣場，一座公園，幾張板凳，左邊還有一個噴水池，右側是教堂，還有白色高聳的樓房，其中一座是“市政廳”，另一座是郵局。拐彎後就是寬闊、白色、美麗的濱海大道，大道靠海的一邊有一些板凳和立柱。到了這裡，我不想繼續坐在人力車上了。下了人力車，我步行朝前走去。海風吹拂，路邊的樹木颯颯作響。海灣似乎被人們遺忘了，周圍的住宅一片寧靜。在海濱大道上，一些馬車不慌不忙地小跑前進。

我來到了那塊巖石前，一下子清醒了起來，

然而又沉入夢想。風景酒店，它就在前面百米遠的山坡上。我沿着彎彎曲曲的小路慢悠悠地朝上走去，五分鐘後已經坐在一間陰冷空蕩的房間裡了。木地板上放着一張床、一個臉盆架、兩張木椅和一張看起來不太結實的桌子。

不過，酒店兩邊的長廊好像是為我專用的，就像下面的花園，充滿陽光，一片陰涼。

南灣朝兩邊彎曲，南端是一座樹木蔥蘢的公園，北端是建有炮臺的岩石山頭。

峻峭的岩石山將這一“風景”地區和後面的地區分開。在海灣上看不到中國帆船，祇有兩隻巡邏艇在遠方穿梭來往。

所有的陽臺都是敞開式的，灰色石頭間鑲嵌着弓形頂窗戶。圍繞這座海港建築的樓房，有的超過了山頂的高度。最高的是聖·安多尼教堂（花王堂）、大三巴遺蹟和東望洋山頂上的白色燈塔。

在一座座住宅之間，高聳的樹幹支撐着大吊燈似的樹冠。海邊，一輛古老的小車在緩慢地行駛，一頂轎子正沿着山坡上移動。在樹林間，無法看見彎曲的中國式屋頂。澳門聳立在午後的深藍色天空下方，猶如一幅精雕細刻的古老版畫。甚至天上飄過的雲彩也露出清晰的輪廓，像一片片輕柔的羽毛，鬚鬚是人工雕琢出來的。在這幅畫中看不見中國的影子。而祇有當送水的老僕人來到時才讓人感覺到中國的存在。

這是當年的最後一天。在這之前的一年裡我是在海上生活的。我從荷蘭人的印度來到中國，其間沒有停歇。我一直身處東方世界，祇不過是生活在和海員打交道的狹小空間裡。我曾經想逃避狹窄的社會生活，然而卻鑽進了地球上最狹小的生活圈子。即使已經在遠東，荷蘭人的奸詐還時時壓抑和纏繞着我，它祇有在面對英國人的猜忌和厭煩時才被忘掉（香港，等）。

流落在一座有着古老文明的城市裡是令人欣慰的，沒有人認識你，不過有時也有一些人向你點頭示意打個招呼。小小的公園裡，女人

們把鮮花插進自己黑油油的辮子上。在經歷一年漫長的漂泊後，終於下船上岸，來到這內海文化的地方，簡直是個奇跡！

雖然，當時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多少深刻的思考，但幾個月後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處於如此和諧的環境中，這種幸福的感覺是生活在壓抑環境中的任何所謂幸福所無法比擬的。

澳門處於孤獨、沒落和疲憊不堪的狀態。我也一樣。不過，儘管趕不上英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香港，儘管其它殖民地在一箇個地失去，儘管遠方的宗主國處於衰落之中，澳門卻保留着它自己緊鄰大海的自然美景。這種美景奇跡般地永久留存。那麼，我怎麼能同它完全一樣呢？

這塊葡萄牙海外領地吸引來客的是大三巴遺蹟以及它過去的輝煌痕跡。澳門象徵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大三巴遺址便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同時，從另一方面講，澳門處於遠東，緊貼着中華大國，因此它成為能夠得以復甦的唯一希望。澳門是西方文化和斯勞烏埃霍夫眼中那個幅員遼闊卻空洞而沒有個性的中華大國之間的交匯點，這是一塊有着能與他自己的疲憊不堪和日益頹廢的靈魂引起共鳴的地方。

在澳門的日子裡，他為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找到了靈感。在那裡，殖民地成了他落筆的焦點。斯勞烏埃霍夫將城市虛構成夢幻般的地方，那裡的時間鬚鬚停滯不前，那裡的今天和過去相似，那裡的西方和東方相融，就是在這種沒落和鬚鬚靜止的氣氛中展開了“禁錮王國”的故事。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相信，他是在首次去澳門時就對賈梅士產生了感情。他前往詩人居住過的巖洞，留下了有關這次行程的記錄：

你們知道我在澳門接觸的第一個人是誰嗎？——賈梅士。

那是個靜謐的下午，到處都是那種安息日的憩靜。我找到了巖洞，或者說叫沙梨頭

(Patane) 的地方，那裡也被稱為他的住處。

找到它並不容易。走過多少彎彎曲曲的街道，爬了無數的臺階，我才來到這個他曾經在那裡寫作的地方。我不說這裡是他“生活”過的地方，因為我知道這裡的流放者的生活還是不錯的。他生活在離這幾里外的某個地方。這裡不是他軀體所在的地方，祇是他的思想和靈感之所在，儘管思維已經日益衰頹。

我在柵欄門前回到了現實。後面是一座花園和一座住宅，不過呈現荒涼和無人照料的境況，這不得不使我感到淒涼。儘管如此，我還是推開柵欄的門走了進去，圍着住宅轉了一圈。沒有任何人攔阻我，更別說在半開半掩的窗口做着日常家務的一位秀氣的姑娘了。

穿過一座玻璃已經破碎植物已經枯萎的溫室，我沿着狹窄的小路朝着被綠色植物覆蓋的巖石山坡走了上去，在一塊爬滿綠葉的巖石後面尋找到了巖洞。它髹髹是敞開的石洞，儘管簡陋卻顯得莊重。酷似賈梅士的半身像安置在一個石臺的中央，旁邊是一塊大理石座碑，上面刻着塔索關於《盧濟亞塔斯人之歌》的題辭，表達了命運同賈梅士相似的里恩茲 (Rienzi) 對詩人的懷念，還有一段中文題辭，贊揚詩人具有孔夫子般的才智。

然而，當我坐在一張粗糙的石凳上看他時，這一切完全消失了。我看到了他那消瘦的臉龐被山羊鬍子拉得更加狹長。衣着雖然破爛，卻也令人尊敬。儘管從城市遠方傳來一些喧鬧聲，還有身邊樹葉發出的颯颯聲，可是此刻我耳邊迴響的祇是他那單調的髹髹訴說着坎坷人生的聲音。

賈梅士到底說了甚麼，從斯勞烏埃霍夫後來的著作中有關詩人生涯的部分可以看到。有關尋訪巖洞的描述——儘管沒有看到賈梅士，是在荷蘭印度的一些報紙上分期刊登他的旅行記時發表的。後來還被收在 *Alleen de havens zijn ons trouw*



澳門白鴿巢巖洞前的賈梅士銅像。站立者是發表了不少有關賈梅士詩選及一本關於詩人在東方生活作品的荷蘭人斯勞烏埃霍夫博士（1926年）

的作品集中。我們也可以認為，他對首次到澳門的描寫是他旅行記的一部分，但旅行記內容的擴展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原有的想法，於是特寫變為虛構，終於形成小說的框架。事實上，旅行記的所有內容也成了小說的主要線索，包括大部分人物的塑造。甚至愛爾蘭無線電發報員這一人物，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其原形：事實是，斯勞烏埃霍夫在澳門遇到了一位原籍愛爾蘭的無線電發報員，還邀請他和其他幾位先生一起駕車觀光。傍晚時分，他們在東望洋燈塔那裡結束了當天的遊覽，並在那裡等待燈塔發出光芒：

來到山頂，有人說我們每人都代表一個民族，而大部分小民族已陷入了沒落。這給大家帶來了壓抑：一位葡萄牙人，一位愛爾蘭人，一位波蘭人，一位荷蘭人，還有一位西班牙人。長時間的沉默，壓抑的沉默。然而，就在這時，我們看到了亮光。我記得在這塊似乎被人遺棄和歷經威脅的地方閃出長長的光束中，我們都朝着自己的祖國送去懷念的目光。我們

眺望着歐洲，或許（它）在幾十年後可能不再是歐洲，不再是那個偉大的祖國。

斯勞烏埃霍夫後來至少又來過澳門一次。從他的日記中，我們知道1927年3月他又一次去了賈梅士巖洞，而且還得到一位在船上工作的澳門人的熱情款待。那是他在2月份從Balik Papan來香港的船上認識的人，或許是一位某某達·席爾瓦太太的丈夫。他還在船上作為醫生為一個難產婦人接生。在他的日記裡還有許多其它關於澳門印象的內容，後來被收進一些散文集和詩集，也被這部小說所引用。其中有四篇收錄在1928年出版的《遠東行》詩集之中，那是他為一位叫某某康斯坦西亞·若澤·達·席爾瓦（Constância José da Silva）的同事所寫的“澳門”章節。稍微看一下他的散文集和詩集，我們就可以明白他在記敘散文和專欄文章的寫作及詩歌創作方面的區別。無論對澳門的描寫，還是對賈梅士人物的刻劃，他都是用現實生活賦予詩人的想象和創意去充份顯示作者的個性，同樣也用來作為《禁錮的王國》一書創作的基礎。

阿媽廟

巖石間的一處屋頂和一縷輕煙告訴人們，那裡便是阿媽廟（當地稱為媽閣廟）。沿着彎彎曲曲的小道，聽着劈哩啪啦的鞭炮聲，就能尋到廟前。阿媽廟是座聳立在巖崖上的帶有金黃色彩繪的紅木建築，廊柱上龍的浮雕髻髻是它的保護神。庭院當中展示着一些已經被馴服的海神。阿媽女神端坐在香火繚繞的大廳中央，露出一副兇險的微笑。她招來了颱風，卻又在風浪吞沒那些無能為力的帆船之前馴服了它們。她實際上是位慈善的菩薩，其實並不像神像那麼兇險。

廟堂裡，老婦人們一個接着一個來到神檯前，往慈善箱裡放下幾枚銅錢。不過，她們那雙簡直比姑娘們頭上的髻髻還要小的三寸小腳實在令人可憐。她們從一臉猷板的和尚手中接過幾炷香，然後

將它們點燃，小心翼翼地捧着走到菩薩前面的大香爐前，將香插在香爐灰上。當感覺到甚麼吉祥的預兆時，臉上便露出幸福的笑容。燃燒着的香火讓空氣中飄溢着濃濃香味。廟裡的氣氛長年平平靜靜，偶爾也能聽到鑼聲。婦女、兒童們不停地進進出出。突然，一陣大風吹來，香滅了，燈籠搖曳，人影晃動。阿媽女神露出一副兇惡的模樣，髻髻要顯示自己的威力。這時，老婦們捏緊拳頭，扯着孩子們趕快離去。

到了晚上，樹木被大風連根拔起，房頂被掀開，甚至山崖上的石頭也被拋到海裡。第二天早晨，海灘上到處可見被颱風吹翻的帆船和被毀壞的設備。（摘自發表於1927年9月17日的日記）

澳門的魔術師

在澳門的港口附近，總有一堆人圍聚一起。在海灘附近一塊紅色地毯上，坐着一位魔術師。

我一開始就對他滿懷信任。他沒有躲在某個街角，也沒有用兜布或在長長的衣袖中隱藏自己的招數。他光着上身，穿着合身的黑色褲子，坐在一處從四面八方都看得清楚的地方。

他敲響一面小鼓，觀眾們漸漸地圍攏過來。他做了一番祈禱的樣子，銅錢便灑落紅地毯上。在他認為觀眾人數差不多的時候，便停止祈禱，抓起四個紅色的小球開始雜技表演：四個小球在空中飛舞，突然小球不知去向，但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陸續飛回魔術師身上意想不到的地方，如眼睛上頭髮上，甚至飛到一些我不便指說的地方。

我好奇地走了過去。全場鴉雀無聲，四個紅色小球在地毯上排成一行。突然，一切髻髻都停止了。魔術師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難道一塊銀圓可起到偌大作用？他繼續在翻動着甚麼，忽然從一隻籃子裡抓出一條長長的蛇。蛇被他抓得緊緊的，不停地扭動。然後，他毫不猶豫地將蛇頭塞進自己的鼻孔，令觀眾們驚恐地往後退。祇有我還站在原地不動，好奇地想看看個究竟。



斯勞烏埃霍夫在澳門（1926）

他一手從喉嚨裡拽出蛇頭，一手將還掛在鼻孔外面的蛇尾拎起，使勁抖動它。突然，他一使勁，將蛇抽出來摔到地毯上，然後將一個像聽筒那樣的東西放到耳朵旁，祇聽見他說：“哈囉，陌生的先生們，你們好嗎？喜歡蛇的表演吧！”跟着當然是一陣戲謔的笑聲。那些“先生們”開始撤退，又有另一群人開始圍攏在奇跡周圍。（摘自1927年9月17日發表的日記：〈澳門魔術師〉）

賈梅士碑

一個溫煦的下午，我在人群中頂着難聞的氣

味穿過小路，尋找在中國乃至東方亞洲唯一的地方，一個為歐洲著名詩人樹立紀念碑的地方！這是一個在英國殖民地休想找得到的地方。我終於在葡萄牙的東方統治的最後一個佔領地澳門找到了它。澳門雖然被那些更加看重生意的人所鄙視，卻被一些認為能夠勾起回憶的人們所酷愛。這裡能夠引起回憶的東西太多了：它依然留存着過去的輝煌跡象，還有祇有在歐洲南部才能見到的誘人景色。它總有着雙重的獨特魅力。

不過，你必須暫時避開這種環境氣氛，穿過大街小巷找到樹有紀念碑的地方，即賈梅士巖洞前。那裡是個寧靜的地方，猶如當初他如此寧靜地生活在他的同胞們中間。

那是一個無人顧及的花園，花房的玻璃已經破碎不堪，裡面的小山丘被一片綠色植物覆蓋。上面是高高的巖石，園中樹蔭下是一塊開闊的空地。這地方真的很荒涼。據說，賈梅士就是在這裡避難時寫下了《盧濟亞塔斯人之歌》的詩集。還聽說他曾經遭遇海難，當時他擔心手稿被水浸濕，便一直用雙手托舉在頭頂。

這一定是一種傳說。

石臺上，端放着賈梅士的半身銅像。臉上的鬍鬚和衣領上的繡花清晰可見，帶有被稱為塔西圖墨的吉列爾梅的作品特點。周圍的凳子上，坐着一些穿着考究的中國年輕人。他們倒不因任何西方人的到來而受影響。

在巖石上還有一塊大理石刻碑，上面是Tasso, Quevedo, Sir John Bowring 及其他人的題辭。我抄錄了一些，沒有任何人理會我。如果一個華人在阿姆斯特丹 Thorbecke 廣場描下 Thorbecke 畫像，難道沒人會去質問和打攪他麼？

我感謝他們的好客，我沒有打攪正在洞窟巖壁上雕刻里恩茲紀念賈梅士碑文的石匠，儘管他已躺在那裡打盹，身子擋住了我的視線。（摘自1927年9月24日發表的日記〈賈梅士紀念碑〉）

帆船

山丘後，
曙光下
霧氣中，
帆船悄悄地海灣上穿梭。
拂曉前它們在地平線上消失
在遠方看不見的海面上捕魚
祇有黑暗將狂風和“鬼魂”帶回
停留在星夜下的礁石間。

已經鼓起的帆慢慢升起，
已經抵禦了多少狂風巨浪
在孤獨寂寞中航行，災難在眼前降臨
從船頭的兩邊撲來。

（摘自1928年出版的《東方-亞洲》）

大三巴教堂

猶如峭壁聳立
聖殿在廢墟深處
髣髴從大地上掃盡，沒有任何屋柱
從過去的豪華建築中留存，

僅有灰色的石碑
在石階上矗立，
在空間如此突出，太陽殿
聳立在遠方神聖的蒼穹。

透過牆上的窗戶洞口
——聖像同彩色玻璃一起被毀——
蔚藍色的自然光束照了進去；
鳥雀們自由進出，光束飛舞。
昔日的威武已經僵硬，

上帝之母支撐地球，
海王爺領着船隊，
神的怒氣摧毀了

它後面的牆壁和樑柱，
祇有寬闊的藍天和無邊的大地
變成了一副背景
背對着已經被破壞的城市。

（摘自1928年出版的《東方-亞洲》）

賈梅士

在與世隔絕的王宮裡度過青春
服役於瘋狂、無聊和自負的王朝。

默默無聞、抱負累累
逃到了新近誕生的地方

他有才智卻猶豫不決
受商人和士兵們鄙視；
在船上，在炮臺上，他是被愚弄的犧牲品
然而，既然無法消滅對方，祇能仇恨他們。

然而，夢想在呼喚：
沒有登上軍隊的戰船
去征服遠方誘人的大地，

祇能在冰涼的山洞中
——一個討厭、浪蕩和流放的詩人——
寫下了《盧濟亞塔斯人之歌》
那令人悲愴的開篇。

（〈澳門，巖窟〉，摘自1928年出版的《東方-亞洲》）

喻慧娟譯